

功震环宇：云南讲武堂师生主导反袁护国战争¹

谢本书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昆明 650222）

【摘要】：1915 年底，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封建帝制，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并且形成了反袁联合阵线。1915 年 12 月 25 日，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并组织了护国军三个军。在护国三军中，营长以上官佐 72 人，曾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和学员人数达 61 人，占官佐总人数的 85%，说明护国军的指挥权事实上掌握在云南讲武堂师生手中。护国战争成了云南讲武堂师生对敌之战，决定战争胜败的川南战场，护国军投入第一军第一、二、三，共三个梯团（相当于旅），营长以上官佐 25 人中，除一人外，全从云南讲武堂出身，几乎成为清一色的讲武堂师生指挥的战争。在川东、湘西和滇南战场上，讲武堂师生亦大显身手。正是由于反袁护国战争的胜利，迫使袁世凯于 1916 年 3 月 22 日撤销帝制。再加上帝国主义列强态度的变化，北洋军阀内部的分裂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反袁护国战争，1916 年 6 月 6 日袁暴毙，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宗旨的护国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护国战争在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方面，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避免了历史更大的倒退。护国战争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从云南开始发动、首次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云南讲武堂师生主导了反袁护国战争，功震环宇，大大提高了讲武堂的地位，从而促进云南讲武堂迅速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军校。

【关键词】：云南讲武堂；反袁护国战争；功震环宇；著名军校

【中图分类号】：K25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8）11-0094-11

一、反袁护国战争的酝酿与爆发

（一）袁世凯复辟帝制和护国战争的爆发

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源于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封建帝制。袁世凯是什么人？他是近年来颇有争议的近代历史人物。有的学者，从近代化的视角，对袁世凯在近代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肯定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他一生：“抵制侵略、力主维新、废科举、建铁路、推行立宪、发展经济，是晚清新政第一人，开启中国近代化之门。”解读乱世枭雄袁世凯的激荡与沉浮，可以透视中国千年大变局的激变与冲突。^[1]袁世凯较为全面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起步和发展。

然而，近年来这些“充分”肯定袁世凯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贡献的学者，却很少提及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以及反袁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的重大功绩。而只是把袁世凯的复辟帝制，简单地归结为他一生中的一次“败笔”，甚至说什么“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一代文化大师脱颖而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家”。^{[1]（P415）}如此论述，是难以理解的。

还有的学者，连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一次“败笔”都难以认可，而把它说成是袁世凯“对中国道路的探索的尝试”，“在很大

¹作者简介：谢本书（1936—），男，四川洪雅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程度上是想借帝制,恢复中央政府的权威”,是“一种对辛亥革命扭曲的矫正”^[2](P5,47,256)有人甚至明确地说,是“中国误会了袁世凯”。袁世凯是要“以君主立宪的国体称帝,可我们误会了他是重开历史倒车”。^[3]

其实,不是我们误会了袁世凯,而是袁世凯误会了中国的老百姓。应该说,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对内独裁,对外卖国,以致复辟封建帝制,是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是实实在在地开历史倒车,是难以否定的“罪责”。所以,歌颂袁世凯的作者,也不得不感叹,弄到这个地步,袁世凯不到60岁时暴毙,“无疑是唯一也是最好的选择”。^[1](P375)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依靠北洋军的枪杆子,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仍不满足,他要的是封建皇帝那样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什么约法、议会呀,都是妨碍他实行专制独裁的东西。为了踢开这些东西,他打起了“统一”的旗号,高喊“统一军令”,拼命集中军权。与此同时,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是接受了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条”,更暴露了他卖国独裁的真面目。

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全国各阶层人民、政党、派别、团体,除了一小撮死心塌地追随袁世凯的爪牙外,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也报道说:“袁的一些挚友因不能同意这样的做法(指复辟帝制),也都弃他而去,所有有头脑的中国人对恢复帝制根本是不屑一顾的。”^[4](P482)

反对复辟帝制、打倒袁世凯成了举国一致的目标,并形成了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为核心的反袁联合阵线,它包括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唐继尧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以蔡锷为代表的民初军政界人士,以白朗为代表的广大农民群众,以冯玉祥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内部的反对派,以及海外爱国侨胞等。他们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旗帜下,行动起来,联合起来,推动了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的爆发。

曾任辛亥云南都督、云南陆军讲武堂兼职教官的蔡锷,于1913年10月调任北京要职。蔡锷最初到北京,还是希望帮助袁世凯,建设好新生的共和国。然而,蔡锷对袁世凯的热情没有维持多久,就被袁世凯独裁、卖国、复辟帝制的行径所扑灭。这样,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蔡锷所抱的幻想,终于被铁一般的事实粉碎,最终走上了坚定反袁的道路。

蔡锷在和他的老师、当时居住于天津的进步党领袖梁启超等人秘商反袁后,经过周密策划,冲破罗网,冒险逃出虎口。于1915年12月19日到达昆明。蔡锷“从北京到昆明,定策于恶网四布之中,冒险于海天万里之外,比之三国时代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其惊险程度不知超过了若干倍”。^[5](P138)蔡锷的冒险抵滇,对云南正在酝酿的反袁斗争是一个新的刺激,加速了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

(二) 护国战争从云南开始爆发

蔡锷到达昆明前夕,风声已很紧张。1915年12月18日、19日两天,北京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连续给时掌云南大权的云南将军唐继尧发出两个急电。第一个急电说,有乱党要人入滇煽动暴乱,准唐继尧全权便宜处置。无论何人,只要有谋乱行为,立即处决,不必先行请示,事后报告备案即可。第二个急电说,据查蔡锷、戴戡等人已来云南途中,请严密查访,决不宽恕。^[6](P18)同时也表明,北京政府对唐继尧还抱有相当大的希望。然而,这时唐继尧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北京政府的电令也只能落空了。

还在蔡锷到滇以前,原国民党人李烈钧、熊克武等人,亦先后抵滇,共同策划反袁武装起义。由于形势发展很快,蔡锷到昆后两天,就与唐继尧一道,于12月21日在昆明召开了半秘密半公开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参加的人员较多,既有云南主要军政人员,亦有来昆的全国各派主要反袁人士。与会人士群情激奋,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宣布起义日期不可再缓,遂决定紧急行动,致电袁世凯,先礼后兵,令其取消帝制,然后宣布云南独立。

12月22日，在蔡锷、唐继尧的主持下，再次召开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反袁护国军政府的组织、护国军的编组，以及起义的各种具体安排。起义者们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歃血为盟。

宣誓以后，起义者们连夜讨论军政府的组织和军队的编组等问题。经过讨论，大家同意以“护国”为名，是“永护中华民国”的意思。^{[7] (P1293)}在会议中，谁留守，谁出征，也有过争论。蔡锷明确表示要率师出征，唐继尧表示谦让，希望远道而来的蔡锷留守，自己统兵出征；李烈钧主张，蔡锷行辈较老，劝蔡锷留守，蔡锷始终不同意。如此反复辩论，“情词诚挚，至于泣下”。^{[8] (P6)}最后以会议多数主张维持现状，蔡出征，唐留守。定名出征者为总司令，留守者为都督，公事彼此用咨文。关于停战、议和等事，须得内外同意。^{[9] (P89)}这样，蔡、唐二位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会议乃三呼“万岁”而散。

12月23日，以云南将军唐继尧、云南巡抚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诛除帝制祸首杨度等13人。电报说：“此间军民痛恨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这等于是最后通牒，电报限12月25日上午10时答复。这个先礼后兵的电报，态度是坚决的，在取消帝制这一点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同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刘显世、李烈钧、戴戡又将给袁世凯电报的内容，联名通电各省知晓。第二天，即12月24日，蔡锷、戴戡二人署名再电袁世凯，进行劝说，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否则，土崩瓦解即在眼前，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到期袁世凯未能答复，于是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任可澄、戴戡等联名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伐袁世凯。这就标志着从云南开始的反袁护国战争正式爆发。讨袁通电一经宣布，昆明“各界人民欢呼雷动，全市游行，高呼打倒袁世凯，拥护共和口号”。^[10]至夜乃息。全国各地亦纷纷响应，轰轰烈烈的反袁护国战争开始了。

二、反袁护国战争的历史进程

（一）护国军政府与护国军的组成

云南宣布独立，武装讨袁的同时，筹组护国军政府，组编护国军，就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决定首先组建云南护国军政府，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制定了《云南都督府组织条例》。

云南都督府成立后，发布了讨袁檄文和一系列对内对外文告，广泛宣传云南起义和反袁护国的正义性，揭示云南都督府内政和外交方针。

同时编组护国军，以蔡锷为讨袁护国军总司令。其时，云南境内有兵力约2万人。面对着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直接指挥25万大军的袁世凯，发扬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果敢地承担了发动护国战争的重任。根据制定的护国讨袁三路出兵计划，决定编组护国三军。第一军以蔡锷为总司令，出兵四川；第二军以李烈钧为总司令，出兵广西；第三军唐继尧以都督名义兼总司令，坐镇后方，策应前线；随后另组挺进军，以黄毓成为司令，相机行动。

护国三军编组及讲武堂师生之说明。²

军都督	唐继尧	同盟会员，讲武堂教官
总参谋长	张子贞	同盟会员，讲武堂教官、校长
第一军总司令	蔡锷	讲武堂兼职教官
总参谋长	罗佩金	同盟会员，讲武堂教官
第一梯团长	刘云峰	国民党员

²参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65页。通电原稿现存南京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为作者亲见。
此编组及讲武堂师生之说明，参见马继孔等著：《云南陆军讲武堂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77~80页。现有所修订。

第一支队长	邓泰中	同盟会员，讲武堂一期学员
营长	李文汉	讲武堂三期学员
	杨希闵	讲武堂三期学员
	马鑫培	讲武堂二期学员
第二支队长	杨蓁	同盟会员，讲武堂三期学员
营长	田钟谷	讲武堂三期学员
	金汉鼎	讲武堂三期学员
第二梯团长	赵又新	同盟会员，讲武堂教官
第三支队长	董鸿勋	同盟会员，讲武堂三期学员
营长	蒋文华	讲武堂三期学员
	周崇颐	讲武堂二期学员
第四支队长	何海清	讲武堂一期学员
营长	唐淮源	讲武堂三期学员
	张光焕	讲武堂三期学员
第三梯团长	顾品珍	同盟会员，讲武堂教官、校长
第五支队长	禄国藩	同盟会员
营长	曹之骅	讲武堂三期学员
	杨福祯	讲武堂一期学员
第六支队长	王秉钧	同盟会员，讲武堂一期学员
	朱德	同盟会员，讲武堂三期学员
营长	杨池生	讲武堂三期学员
	郑森	讲武堂三期学员
第四梯团长	戴戡	进步党员
第七支队长	熊其勋	
第八支队长	王文华	国民党员
第二军总司令	李烈钧	同盟会员，讲武堂教官
总参谋长	何国钧	同盟会员
第一梯团长	张开儒	同盟会员，讲武堂监督、教官
第一支队长	钱开甲	国民党员，讲武堂教官
营长	杨德源	讲武堂三期学员
	戴永翠	讲武堂三期学员
第二支队长	盛荣超	讲武堂一期学员
营长	洪锡龄	讲武堂三期学员
	赵德裕	讲武堂三期学员
第二梯团长	方声涛	同盟会员，讲武堂教官
第一支队长	黄永社	同盟会员
营长	朱培德	讲武堂三期学员
	杨益谦	讲武堂三期学员
	王均	讲武堂三期学员
第二支队长	马为麟	武备学堂学员
营长	张怀信	讲武堂三期学员
	范石生	讲武堂三期学员

第三梯团（实	示未组建：	）
炮兵团长	鲁子材	讲武堂三期学员
第三军总司令	唐继尧 （兼）	
总参谋长	庾恩旸	同盟会员，讲武堂教官
第一梯团长	赵钟奇	同盟会员，讲武堂教官
第一支队长	华封歌	国民党员，讲武堂一期学员
营长	胡瑛	讲武堂三期学员
	张汝骥	讲武堂六期学员
第二支队长	李植生	同盟会员
营长	胡若愚	讲武堂六期学员
第二梯团长	韩凤楼	讲武堂校长、教官
第二支队长	吴传声	同盟会员，讲武堂一期学员
第四支队长	彭文治	讲武堂三期学员
第三梯团长	黄毓成	同盟会员，讲武堂教官
第五支队长	杨杰	国民党员，讲武堂教官
第六支队长	叶成林	讲武堂教官
第四梯团长	刘祖武	同盟会员，讲武堂校长、教官
第七支队长	杨体霞	讲武堂三期学员
第八支队长	李友勋	国民党员，讲武堂一期学员
第五梯团长	庾恩旸 （兼）	
第九支队长	唐继禹	国民党员，讲武堂六期学员
第十支队长	赵世铭	国民党员，讲武堂三期学员
第六梯团长	叶筌	同盟会员，讲武堂教官
第十一支队长	马驄	国民党员
第十二支队长	邓坝	
不明所属支队		
营长	赵遂生	讲武堂六期学员
	项铎	讲武堂三期学员

第三军第三梯团后改成“挺进军”，黄毓成为总司令，杨杰成为第一纵队司令，叶成林为第二纵队司令。

可见护国三军营长以上官佐 72 人（重复兼职未计人），曾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和学员人数达 61 人，占官佐总人数的 85%。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而且护国三军总司令，都是云南讲武堂教官，说明护国军的指挥权事实上掌握在云南讲武堂师生手中。而在关键的护国川南战场上，护国第一军的第一、二、三梯团营长以上官佐的 25 人中，除刘云峰（也是国名党员）1 人外，全是讲武堂出身，换言之这几乎是清一色的讲武堂师生指挥的一支坚强的滇军。护国战争事实上是云南讲武堂师生对敌之战，其最终的胜利，使云南陆军讲武堂声名鹊起，功震环宇。

（二）决定战争胜败的川南战场

1. 首战叙府

云南宣布独立讨袁，好像平地一声惊雷，吓坏了袁世凯。袁世凯惶恐不安，举止失措，急忙召开国务会议，商量对策。在这次国务会议上，袁世凯语无伦次，上句不接下句，甚至抱怨说：“云南已经自称政府，照会各国驻华领事、使馆，脱离中央，这件事（指复辟帝制），我本来不主张，是你们逼着我干的。”³与会人员大吃一惊，大惑不解，袁世凯自己要当皇帝，现在却把责任推给大家。

不过，袁世凯毕竟是个老狐狸，震惊之余，又镇静下来，要求与会者认真研究，从政治、军事方面部署对云南的反扑，设法把滇军压制在云南境内加以消灭。袁世凯在对云南起义队伍进行政治分化，收买、利诱的同时，决定调派大军南下，围剿滇军。

袁世凯在“新华宫”（北京中南海内）丰泽园，设立征滇“临时军务处”，亲自主持对护国军的用兵计划，指挥北洋军分兵三路，大举向云南进逼。第一路，由湖南本部经贵州向云南进攻，兵力约 2.6 万人。第二路，由四川方面进攻云南，兵力达 4.5 万人，因而川南战场成为反袁护国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战场。第三路由广东派兵入侵滇南，扰乱护国军的后方，兵力不到 1 万人。

还在云南宣布独立、武装讨伐前夕，滇军决定派出邓泰中、杨蓁（两人都是讲武堂学员）两个团，以“剿匪”名义，先行向川边移动。这两个团原名滇军第一、第七步兵团。云南于 1915 年 12 月 25 日宣布独立讨袁，两团尚在进军途中，奉命改编为护国第一军第一梯团第一、二支队。两支队在昭通集中后，并力向川南重镇叙府（今宜宾）推进。

其时，袁世凯及其爪牙、四川将军陈宦，命驻成都的伍祥桢第四混成旅向叙府开进；命驻川北的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集结内江、泸州一带布防；命川军周骏第一师进驻泸州，命在川南的刘存厚第二师，加强川黔边境永宁（今叙永）一带的戒备，大军云集川南。袁世凯为笼络部下，特封陈宦为一等侯，册封周骏、刘存厚为二等男爵。

邓泰中、杨蓁两支队经过 25 天的徒步行军，到达川滇边境，一举攻下敌人严密防守的滩头、黄坡耳、燕子岩、捧印村等地，乘胜直追，于 1916 年 1 月 18 日夺取横江，初战告捷，1 月 28 日占领叙府的门户安边镇，经过横江、安边打击后，北洋军伍祥桢旅士气低落，在护国军的追击下，舍弃叙府往北逃走。这样，叙府城内空虚，城内官员、绅士、商人、学生界以及部分川军，派出代表出城迎接护国军。护国第一军第一梯团遂于 1 月 21 日晚 10 时开进叙府，占领叙府城。这是护国军人川战斗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全国震动很大。

袁世凯遭到严重挫折，大为震怒，下令撤销伍祥桢的“川南镇守使”职务，令其“戴罪立功”，策划组织反攻。四川将军陈宦指挥冯玉祥、伍祥桢、朱登五等部，分别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围攻叙府，并规定三路军分路合击，同时发起进攻。由于敌人卷土重来，兵力处于优势，保卫叙府之战打得相当艰苦。结果伍祥桢部再度被击溃，北洋军中的精锐冯玉祥旅亦被击退。川军进攻叙府的第三路军亦遭惨败。从 1 月 29 日到 2 月 8 日的十天战斗中，护国军以 2000 人的兵力，打败了北军 1 万余人的多次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

然而战争形势不断变化。恰在此时，蔡锷领导的第一军主力第二、三梯团，到达了泸州前线，与数倍于己的泸州北军发生激战。由于泸州是北军重点防守的川南重镇，兵力雄厚，武器准备充分，还有援军不断开来，因此战斗相当惨烈，护国军几至不支。蔡锷不得已从叙府前线抽调第一梯团主力，支援泸州战场。其时，在叙府的护国第一梯团两个支队四个营，加上后来支援的刘发良昭通独立营，共五个营。由于泸州战事吃紧，先后抽调了四个营到泸州前线，叙府只剩下第一梯团第二支队第二营（田钟谷营），且战斗减员较大，缺额较多。北军乃督促冯玉祥、伍祥桢两旅，重整旗鼓，反扑叙府。

守卫叙府的护国军这时只有田钟谷一营，加上新增加的刘国威工兵一个连（这个连多半由退伍老兵组成）。田营加上工兵连，

³参加袁氏召开国务会议的袁政府秘书长张一磨在《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上的亲笔眉批，原文是：“尔等逼余为之”。参见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上海人文月刊社，1936 年版，第 302 页。

能出战的事实只有 200 余人。虽还有一个炮兵连，但只能做步兵阵后支援。敌人两个旅发起进攻后，田营不支被迫后退。而刘国威工兵连在掩护田营撤退时，坚守阵地，与敌人死拼，结果全连伤亡殆尽，刘国威本人亦壮烈牺牲。敌人控制了城东制高点，加上兵力悬殊，护国军乃决定撤出叙府。3 月 1 日夜，护国第一军第一梯团团部、田钟谷营等全部撤出叙府，退守安边。叙府乃得而复失。

冯玉祥旅于 3 月 2 日重新占领叙府，袁世凯特封冯为三等男爵。当时，冯军颇占优势，有力量长驱直入云南，或移兵抄袭泸州护国第一军主力的后方，如果这样，护国军及云南局势将相当危险。但是，冯玉祥这时的思想发生变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这样，叙府附近，南北两军实际上处于休战状态，双方暂取守势。不久，冯玉祥干脆从叙府撤军，到成都劝四川将军陈宦，要其认清大势，尽快独立反袁。

2. 激战泸州

护国第一军第一梯团出师川南重镇叙府之后不久，蔡锷举护国第一军第二、三梯团主力于 1916 年 1 月 14 日从昆明出发，指向川南另一重镇泸州。蔡锷所率赵又新、顾品珍第二、三梯团取道永宁（今叙永），向泸州方面进军。而董鸿勋支队（第三支队）为先锋，先于 1 月 10 日从昆明出发。朱德支队（第六支队）则于 1 月 28 日最后离开昆明。这支具有良好纪律的正义之师，沿途受到滇川等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正如朱德所说：“自滇以达蜀地，（群众）无不箪食而迎。”^[11]

1916 年 1 月 26 日，董鸿勋先锋支队抵达贵州毕节。这时第一梯团已于 1 月 21 日攻占叙府，1 月 27 日贵州又宣布独立讨袁，响应护国，这对护国军是很有利的。于是，曾任过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在云南参与辛亥起义的同盟会员、川人刘存厚，时任川军第二师师长，决定与云南护国军联络，准备响应护国起义。

此时，刘存厚率部正在川南泸州、永宁一带“清乡”，并奉命阻击护国军。董鸿勋支队到达贵州毕节时，刘存厚正酝酿响应起义，即派遣杨必慎、李良材到毕节，表示欢迎，并与董鸿勋商定：待护国军进入四川境内，两军假作对垒，刘部诈败而退，护国军步步尾追，进抵泸州，则两军合二为一，直捣泸州城。于是，董鸿勋支队兼程前进，1 月 29 日到达川、滇、黔三省交界的赤水河。在赤水河渡边上，以“四川绅商学界”名义挂起的大幅标语，还用红字大写“欢迎”二字。护国军顺利通过赤水河，到达雪山关。

然而，刘存厚起义计划被泄露，北军已有预防。刘存厚原定配合护国军，出敌不意，夺取泸州城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遂于 1 月 31 日以“中华民国护国川军总司令”名义，在泸州南的纳溪县城宣布起义讨袁，决定“联合滇黔，挥旗北伐”。^{[12] (P133)}刘存厚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两路 4 个支队，计划攻取叙府与泸州之间的江安、南溪，以支援护国军在叙府的守军，打通纳溪与叙府之间的道路，做好进攻泸州之准备。

泸州地处沱江流入长江的汇合口，是川南通往云南、贵州的水陆交通要道，上连叙府，下扼重庆，是川南第一重镇，控制川南必争之地。泸州城北枕沱江，南临长江，东据两江汇合口，西有险隘龙透关，易守难攻，有“铁打泸州”之称。董鸿勋、刘存厚为攻取泸州，决定由西、南两路分进合击，先夺取泸州南岸的兰田坝，扫清长江以南的敌人，控制南岸作为前进基地。2 月 5 日晨，两路同时发起进攻，董支队于 2 月 6 日占领兰田坝，护国军方面阵亡 8 人，毙伤敌军达数百人。2 月 8 日，董支队趁太安场附近大雾弥漫，遮掩着长江水面，即以两营渡过长江，迅速从两侧包抄敌人固守的大龙山高地，迅速夺取高地，并突破敌人在罗汉场的防线，迫使敌人退守小市。董支队逼近小市，隔着沱江与泸州城仅距几百米对峙，兵临城下，泸州似可唾手可得。

北军大为惊恐，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旅长熊祥生不断告急，北军曹錕师、张敬尧师、李炳之旅等各一部，加紧向泸州移动。北军至泸州前线部队从 1.5 万人增至 3 万余人，而蔡锷指挥进攻泸州的护国军，加上起义的川军仅 5000 余人，力量悬殊，战局随时可能发生变化。2 月 9 日晚，熊祥生组织敢死队，混在难民队伍中，谎称过江避难，刘存厚所部陈礼门派在沙滩渡口的防守队长田伯施受敌欺骗，未予阻止。熊祥生敢死队渡江后，突然向护国军月亮岩阵地冲锋，月亮岩炮兵阵地连同大炮为敌人

夺取。这样敌人从沙滩渡口不断涌来，于2月10日占领营盘山、兰田坝等地。陈礼门组织反击，但遭敌人居高临下的强力压制，没有取得进展，陈礼门羞愧开枪自杀。

这样就失去了最后进攻泸州的机会，董鸿勋支队孤军深入，处境不利，遂由原路渡江返回太安场，再组织反攻，却未能扭转局面。这时蔡锷率领的护国军第一军主力尚未赶到前线，董支队与刘存厚部汇合后，于2月12日退到纳溪东南城外，暂时稳住阵局。

蔡锷率护国第一军主力兼程前进，何海清支队于2月13日夜间赶到纳溪，禄国藩、朱德支队随后到达。这时敌我双方都在纳溪间集结了重兵，从2月14日到3月6日双方进行了第二阶段紧张、激烈的拉锯战，为时达三星期之久，战役绵延数百里。朱德回忆说：这时川南地区几乎“全部化为战场”。^{[13] (P134)}

纳溪县城，从当地发源的永宁河向北流入长江的汇合处，北临长江，东北面为通往泸州的大道，西与永宁河口左岸的安富街、冠山相犄角，南面是由南向北的永宁河，接近纳溪的沿河集镇双合场。敌军以兰田坝为基地，分三路直攻纳溪，对准纳溪正面和东北面两路为佯攻，主攻则从兰田坝前进。2月14日晨，敌军主力部队田树勋旅已窜至牛背石，迂回到护国军阵线侧后，并推进到高洞场，与董鸿勋支队相遇，敌人依仗人多炮精的优势，猛攻董支队。董支队顽强阻击，仍难阻止敌人前进。从下午2时，董支队与敌田树勋旅，在双合场的小河两岸激战到天亮，董支队终于守住了阵地，双方暂时沉寂。

2月15日晨，护国军发起反攻，禄国藩支队由泸纳本道向兰田坝正面推进，何海清向棉花坡进攻，而敌田树勋旅从双合场上游小河潜渡，越过永宁河，到达纳溪城西南，向纳溪城袭击。正向棉花坡进军的何海清支队，奉命紧急折回，绕道至冠山西面，反击敌人左侧，刘存厚军谢松营驰至永宁河右岸，攻击敌人右侧；炮队对隐匿在冠山南面的敌军猛烈攻击。敌人在三面攻击下，退回双合场，又遭截击，遂全线混乱，狼狽溃逃。这一仗，敌人伤亡1700余人，其中有营长9人，旅团长大部分受伤。^{[14] (P47)}

3. 鏖战棉花坡

1916年2月13~15日，护国军在纳溪城下和双合场的激战，是一次重要的险恶的战斗，最终粉碎了敌人的攻势，巩固了纳溪防线。敌人以兰田坝为据点，占领了棉花坡相对的朝阳观、菱角塘等阵地，用优势兵力，正面强攻纳溪，从2月16日起，敌我两军在泸纳之间，又进行了以棉花坡为中心的另一起艰苦的战斗。

棉花坡是纳溪城东郊一系列山岗中的制高点，距纳溪县城约5公里，是泸州通往纳溪大道的必经之地，也是军事上必争之地。在战斗紧张之际，朱德支队奉命守卫棉花坡，敌人以猛烈的炮火，攻击棉花坡护国军阵地，棉花坡山林的松树几乎全部被炸毁。朱德支队一到，立即投入战斗，奋不顾身，勇猛还击，突破敌人中央防线，迫使敌人撤退数里。

敌军为强化攻势，重新调整兵力，增援加强。敌军张敬尧师之田树勋、吴新田两旅，曹錕师之吴佩孚旅以及李炳炎旅，川军熊祥生旅之刘湘团等部，集中于纳溪城棉花坡、双合场等地。双方兵力对比，敌军颇占优势。顾品珍率禄国藩、朱德两支队在棉花坡前线，但兵力仍严重不足，蔡锷抽调第一梯团李文汉营及金汉鼎支队（原杨蓁支队）两营增援纳溪前线，争夺棉花坡。朱德支队在战事紧张之际，连续打了三天三夜，毫无间歇，以善打夜战和白刃战而出了名，立下战功。^{[13] (P133)}朱德支队坚守的棉花坡正面陶家瓦房背后高地，与据守红庙高地之敌，仅隔水田一片，敌日夜大炮轰击，松林坡被打倒，毁落的松针也有数寸之厚。^[15]护国军营长曹之骅、雷淦光先后壮烈牺牲，战斗打得相当艰苦。

第一军总参谋长罗佩金、第二梯团长赵又新深入前线，指挥朱德等部从2月19日到22日，连续发动四次强大攻势，终于顶住了敌人的压力，使棉花坡鏖战取得了初步胜利，使泸纳之战转入“攻势防御”。蔡锷命令朱德接任第三支队长，继续扼守棉花坡阵地。尽管敌人又多次发起进攻棉花坡的战斗，但护国军棉花坡阵地岿然不动，直到3月6日，护国军实行战略转移，朱德支队才离开了棉花坡。朱德在这里战斗了几十个日日夜夜，赢得了“勇猛善战”“忠贞不渝”的名声，成为护国战争中蔡锷的

“四大金刚”之一。见过他在棉花坡作战的人说，朱德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似乎有无穷的精力。^{[13] (P134~135)}

以棉花坡为中心的纳溪保卫战，鏖战月余，敌军被打死打伤三四千人，而护国军死伤及失踪不下一千人。蔡锷回忆说，在那艰苦战斗的日子里，尽管力量悬殊，护国军人数有限，武器弹药供给不足，以劳攻逸，地势不利，但是士气坚定，上下一心，虽伤亡颇重，昼夜不得安息，风餐露宿，不为所阻。“我军士气百倍，无不以一当十。”^[16] 因此，虽然我军“屡濒于危，皆能绝处逢生”，^[17] 化险为夷。

护国军经几十天的艰苦战斗，伤亡颇重，极度疲乏，亟须休整。为此，蔡锷在 3 月 6 日下令后撤，护国军各部有秩序地分别转移到大洲驿、叙蓬溪（今四川叙永县护国镇）、白节滩一线布防。蔡锷总司令部设于纳溪以南 35 公里的永宁河畔大洲驿；刘存厚部则转移到了古宋。护国军撤退后，北军也不敢追击，双方阵地相距约 20 公里对峙。

护国最激烈的川南战役，双方死伤较大，北军死伤尤甚。正如蔡锷所说：“此三星期之巨战，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

4

护国战争中，除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战场——川南战场外，尚有川东、湘西和滇南三个战场。这三个战场中，护国军的指挥官，出身于云南讲武堂的也占有相当的比例，限于篇幅就不详细介绍了，这是讲武堂师生在护国战争中的又一功绩。

（三）袁氏帝制被迫撤销

蔡锷退驻大洲驿后，将司令部设于大洲驿旁永宁的一条大船上。几天以后的 3 月 15 日，广西宣布独立，武装讨袁，护国军经过短期休整，蔡锷遂于广西宣布独立讨袁的同日，连下六道命令，准备反攻。3 月 17 日，蔡锷下达了总反攻的命令，护国军分三路反攻，中路为顾品珍梯团，其任务是占领茶塘子高地，以威胁遥子岩之敌人。左路为何海清支队和刘存厚部，以何支队进驻和丰场一带，警戒顾品珍左侧；刘部进驻牛滚场一带，威胁江安之敌。右路是这次反攻的主力，由白节滩向牛背石、纳溪前进，以扫清长江南岸为目的，参战部队是赵又新梯团的金汉鼎、朱德支队和四川义勇军张煦、廖月疆支队。^[18] 朱德支队担负着右翼的主攻任务，责任重大，所以大反攻前夕蔡锷特别召见了朱德，当面向他交代战略意图。

护国三路军同时发动进攻，连战皆捷，先后拿下江安、南溪等地，重新夺回纳溪，朱德支队更是长驱百里，像尖刀一样直插张敬尧大本营泸州，先头部队抵达距泸州仅 10 余里的南寿山附近，北军士气大为衰落，已无还手能力。

但是，护国军兵力有限，武器弹药缺乏，终未能冲破泸州敌人的最后防线，蔡锷乃于 3 月 22 日下令各部撤出战斗，退回原阵地防守。而敌人亦死伤惨重，无力组织新的反攻。北军主力张敬尧第七师，前线长官伤亡殆尽，营长只剩一人。张敬尧承认：“我自当排长起，现在已到师长兼总指挥，未离开第二十五团，护国军那一顿刀搠死我七八百人，全师共死二三千人，我的精锐消耗殆尽，你看伤不伤心，我还打什么？”^{[19] (P97)} 由于双方都难以组织再进攻，川南战事遂成胶着状态。

然而在这护国战争中战斗最激烈、投入兵力最多的关键战场上，由于护国军的不断胜利，最终稳定了战局，就为护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这场战争中投入的护国第一军第一、二、三梯团营以上的指挥官，几乎全是云南讲武堂的师生，即便是在川南起义的川军第二师，其指挥官（师长）刘存厚亦曾是云南讲武堂的教官。川南战场实际上是讲武堂师生显示其辉煌战绩的地方，也大大提高了云南讲武堂的名誉。

眼见袁世凯的江山摇摇欲坠，各帝国主义国家逐渐改变了对袁世凯帝制的支持态度。袁世凯北洋集团已处于土崩瓦解、分

⁴参见：庾恩珣：《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下册），云南省图书馆，1917 年版，第 10 页。当然过分夸大此战役之规模及其伤亡人数也不是妥当的，因为它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如张晓蕾说，护国入川滇军，前后伤亡不下“十万”人。参见张晓蕾：《云南讲武堂，百年军校，将帅摇篮》，原载《中华英才》2011 年第 17 期；《新华文稿》2011 年第 23 期转载。其实，护国军进入川南，包括叙府、泸州前线在内，总人数不足一万人，怎么可能伤亡“十万”呢？

崩离析的状态中。因此，云南起义后，袁世凯准备于1916年元旦或春节（2月3日）登基的计划，不得不一再延缓。3月中旬，继广西独立之后，护国军川南反攻又取得重大进展，北洋军遭到严重打击。于是，袁世凯不得已于3月22日下令撤销“帝制承认案”。袁氏撤销帝制的“申令”，却仍以“本大总统”自称。^{[20] (P330~333)}第二天又发布文告，废除“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纪年；将恢复帝制的公文800余件，进行销毁。袁世凯的“皇帝梦”，遂成泡影。

三、反袁护国战争的胜利

（一）斗争在继续

反袁护国战争能够夺取最后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战争的正义性，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护国战争，是一次革命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人民群众觉醒的程度和投身革命的热情，超过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武昌起义，达到了新的深度和高度，不仅在云南如此，全国也不例外。

其次是列强态度变化。袁世凯复辟帝制，最初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和纵容是分不开的。然而，帝国主义各国对华关系的实质是控制与掠夺，是以利害关系为准则的。反袁斗争在全国逐渐明朗化以后，日、英、俄三国外交使节向袁政府提示质询，后来，法国、意大利也加入三国对袁政府的“劝告”。12月15日，日、英、俄、法、意五国联合警告袁政府，决定对袁政府“执监视态度”。^{[20] (P298)}反袁护国战争正式爆发以后，日本不仅拒绝袁政府特使访日，还拒绝承认“中华帝国”。袁世凯从1916年元旦起改年号为“洪宪”的公文，遭各驻华公使拒收。袁世凯对于皇帝欲做不能，若丢可惜，不得已当了个“两面人”：对内称皇帝，对外仍称总统。从1916年元旦起，袁世凯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对内用“洪宪”纪年，关起门来做皇帝；对外仍用民国年号，仍称中华民国总统。

再次是北洋内部的分裂。袁世凯依靠北洋军队起家，又依靠北洋派集团来维持统治。袁世凯掌握了全国最高权力以后，其心腹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亦随之分享了巨大权力，渐渐不像以前那样把袁世凯当作衣食父母了。袁世凯复辟帝制过程中，对段、冯等有戒心，帝制复辟活动实际上是背着他们进行的。帝制活动明目张胆进行之际，北洋十四省将军联名密呈袁世凯，希速正“大位”，而江苏将军冯国璋、安徽将军张勋却拒绝签字，不予列名。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冯国璋在南京拥兵自重，不听袁的调遣，还与护国军暗通消息。原国务总理段祺瑞则始终站在一旁，冷眼旁观。护国战争打响后，袁世凯指挥不灵，先后请冯国璋、段祺瑞出任参谋总长，都遭到拒绝。袁世凯向北洋元老徐世昌及副总统黎元洪求援，徐世昌辞职而去，黎元洪也坚辞副总统并隐居。袁世凯出兵南下对付护国军的部队第一批出发后，第二批再没有愿意去的了。袁已调度失灵。

广西宣布独立后，冯国璋等人估计袁世凯末日已为期不远，企图拉拢一支独立于袁世凯与护国军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利用护国军打倒袁世凯，又联合北方军人压制护国军，从中渔利，得以取袁世凯而代之。冯国璋与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安徽将军张勋等5人联名发出密电，征求各省将军意见。“五将军密电”虽对南北双方都提出了要求，但主要矛头是针对袁世凯的，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元首辞职等。这个“，密电”表明，北洋集团事实上已崩离析。

袁世凯获悉密电后甚为震惊，乃紧急召开公府会议，不得已做出取消帝制、保住大总统职务的决定。袁世凯帝制活动虽已寿终正寝，但他还要进行垂死的挣扎，这就是宣布撤销帝制，还想保住大总统职务。

护国军方面继续坚持斗争，发出通电，不仅不承认袁世凯仍为民国总统，而且要求对袁世凯进行审判，电文指出：“今日正当办法，惟有三事。（一）袁即日退位，听候组织特别法庭裁判。（二）按照约法，要请黎副总统黎公继承大总统。（三）从速召集袁氏非法解散之国会，重谋建设。以上三事，国命所关。”护国军表示，一致决心，以求此目的。^{[21] (P39~41)}唐继尧又连发数电指出：“袁氏真诚悔过，宜即此时毅然引退”“项城不去，乃真无可收拾也”。^{[22] (P45~49)}护国军坚持，除袁氏退位以外，更无调停之余地。

南北双方战事虽然停顿了下来，但在袁氏退位问题上，分歧太大。一方坚持要袁退位，一方死赖着不退，毫无妥协之余地。袁世凯企图做最后挣扎，4月22日以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5月8日公布修正组织法，撤销其复辟帝制的办事机构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国务总理名称。他要利用段祺瑞未附和帝制的名声，团结北洋势力，组织“战时内阁”，准备重新以武力打开局面。同时派人去南京，说服冯国璋，支持袁世凯仍留居大总统。

护国军方面感到形势仍然严峻，在要求袁世凯下台的同时，继续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在全国人民反袁继续高涨的形势下，4月6日广东宣布独立，然而广东部独立不反袁，因此广东方面斗争仍然颇为复杂。

护国军及其反袁独立各省坚持要袁退位，坚持对抗袁氏非法政权，并积极筹备南方的统一机关，以代替北京政权，处理军国大事，为此先成立两广（广东、广西）统一机关。1916年5月1日，两广都司令部在广东肇庆成立，以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曾任云南讲武堂总办）为副都参谋等。都司令部具有军事、政治领导机关的雏形。

5月8日，作为南方统一的临时政府——护国军军务院亦在广东肇庆成立。这是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反袁独立各省联合建立的统一军事政治性质的机关。军务院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李根源为滇桂粤联军副都参谋兼摄都参谋，各省独立的军政首脑及护国各军总司令蔡锷、李烈钧、罗佩金、刘存厚（皆云南讲武堂教官）等为抚军。军务院成立后，同时发出五号宣言和多起通电，集中到一点，就是公开否认袁世凯的总统资格及其政权。军务院是南方统一的临时政府性质的机关，不过只是名义上如此，它在事实上没有起到领导独立各省的作用。但是军务院成立本身就表明，护国军一定要袁世凯下台的决心，这在护国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军务院成立后，曾从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发动了一系列攻势，给袁世凯政权以沉重打击。当时报纸报道：“北京政府所惧者，南方军务院之组织已俨然一临时政府。从前南方势力虽大，尚无统一机关，北方尚有城社可凭。今如此，则所谓中央政府已无复奇货可居。又连接紧要报告，南方一面依法戴黎，一面通告驻京各国公使废止北京政府，此等消息较之某省独立、某战失败之惊报，何啻十倍。”^[23]所以说，军务院成立，滇、黔、桂、粤联军西南，声震全国。“风声所播，大义已彰，袁氏知其不可屈，而卒悲愤以死。”^{[24] (P45)}这个事实，对于进一步鼓舞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信心，具有积极意义，也反映了军务院成立的价值。

（二）袁世凯暴毙

反袁斗争在继续发展，继广东之后，浙江（4月12日）、陕西（5月9日）、四川（5月22日）、湖南（5月29日）相继宣告独立。湖南独立之后不过一星期，袁世凯就忧愤而死了。曾有人以打油诗嘲讽说：“扶运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指筹安会发起人杨度等六人，“二陈汤”指陕西独立的陈树藩、四川独立的陈宦、湖南独立的汤芑铭。这说明陕西、四川、湖南的宣布独立，对袁世凯精神打击是很大的。

自从袁世凯撤销帝制后，护国前方战事实际停顿下来。在四川前线，双方商定，从1916年3月31日起，先停战一周。停战期满，又延长一个月；一个月停战期满，再延长一月至6月6日。这样，关键的川南战场的停战协定，自帝制撤销后即已实现。但是，全国性的议和因双方意见分歧，直到袁世凯死亡，都未曾举行过会议，尽管在各战场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军事行动。

北洋军阀内部仍在继续分化的同时，全国各阶层各界各行业的人民群众，不仅反对袁世凯继续把持总统职务，也谴责段祺瑞、冯国璋妄想承袭总统的可耻行径。

袁世凯仍执迷不悟，于5月29日公布了《帝制议案始末》，推卸责任，捏造事实，强加于人，说什么：“即今日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所能料及。”“反对之徒，往往造言离奇，全昧事实，在污蔑一人名誉、颠倒是非之害小，而鼓动全国风潮、妨碍安宁之害大。”最后以威胁的口吻扬言：“将各省区军民长官送请改变国体暨先后推戴，并请正大位各电，另行刊布。”^{[25] (82~83)}他以为这样做会缓和舆论，博得同情，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帝制议案始末》的公布，更暴露了袁世凯企图进行垂死挣扎的妄想。

然而，无可奈何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唾骂声中，一病不起，陷入了绝望之中。延至 1916 年 6 月 6 日上午，终于一命呜呼，暴死了。袁世凯一死，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宗旨的护国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战争也就无形结束了。随后，7 月 14 日护国军军务院宣布撤销；7 月 25 日，中华革命党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这就标志着反袁护国战争以胜利完全结束。

（三）护国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

反袁护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袁世凯评价的升温，对反袁护国战争的认识和评价，大大地打了折扣。有人认为，护国战争“没有形成民主革命的主流”，^{[26] (P64)}把护国战争排斥在民主革命范畴之外。又有人说，护国战争是古今中外罕有的“奇怪战争”，双方实际上没有打几场硬仗，明里暗里或声讨，或调停，各种通电满天飞，“口舌战争”打得远比实际战斗激烈。^{[1] (P385)}甚至说什么，袁世凯复辟帝制，是要“以君主立宪的国体称帝，可我们误会了他是开历史倒车^[2]”。对这些论述，笔者有专文质疑，^[27]这里只做简短的回应。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近代中国的革命，就是这些基本矛盾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28] (P61)}因此，在近代中国，只要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都应该是民主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主流或主流的组成部分，应属于民主革命的范畴。

护国战争的直接目标是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维护辛亥革命以来建立的共和制度，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护国战争应是反帝反封建的，毫无疑问应属于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它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仅次于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运动。所谓“辛亥首义，民国建立，护国讨袁，共和再现”，其历史地位应予以充分肯定。

护国战争在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方面，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避免了历史更大的倒退。护国战争的历史表明了辛亥革命以后，封建余孽任何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遭到失败。一切违反历史规律，违反人民意志的倒行逆施，都将为历史发展的车轮所轧碎。护国战争对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变，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为了进一步说明护国战争的历史意义，我们不妨从名人眼中的角度，再来做一番探讨。近代众多的文化名人，不管他属于哪一党，哪一派，对反袁护国战争及其领导人蔡锷有许多肯定的共识，这在中国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是罕见的。梁启超的评价很高，众所周知，这里就不多说了。而著名国民党人徐谦在 1916 年 3 月 10 日给护国军领导人之一唐继尧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护国军“讨叛逆之众，名正言顺，大义昭然”。而且是“民国之唯一义战”。此战非仅为“共和与帝制之战，乃国家存亡之战也”。⁵把护国战争看作是民族兴衰、国家存亡之大事，是有代表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主宰中国政局的先是国民党，后是中国共产党，国共两党不管有多少矛盾和斗争，但两党主要领导人对于护国战争都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它是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否定国共两党领导人共同的、基本的论断呢？

国民党早期领导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在 1916 年 12 月 13 日致电当时大总统黎元洪和北京政府国务院指出，辛亥革命有“民国开创之功”，而护国战争为“中国中兴之业”，建议将 1915 年 12 月 25 日的云南护国起义日，定为中华民国国庆日，以取代 1911 年 10 月 10 日的武昌起义纪念日。^{[29] (P40)}于此可见，孙中山对云南护国起义评价之高，应是不难理解的。尽管这个建议未成为现实，但它表明护国战争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心中所占的地位。因此，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将护国战争称为“第三次革命”，也完全可以理解。

⁵徐谦给唐继尧信（1916 年 3 月 10 日），见王水乔、刘大伟主编：《护国运动文献史料汇编》（第 5 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 689、691 页。此信手迹，为唐继尧搜集保存，编入《东大陆主人友声集》（手迹原件），存云南大学图书馆，此为首次公布。

1916年5月1日，在上海云南驻沪代表李宗黄的欢迎会上，孙中山高度评价护国起义说：“霹雳一声，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扬，作战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奋，响应之迅速，与黄花冈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轻，充分表露中华民族之正气，中华革命党之革命精神，不唯使筹安丑类，胆战心惊，即袁世凯，亦何异天夺其魄。”^[30]
^(P151)将护国战争与辛亥武昌起义相媲美，这实际上表明护国战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民主革命或民主革命主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成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对护国战争的肯定评价也明白无误。

中国共产党人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都有肯定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护国第一军所属支队长（团长），后来是旅长的朱德，川东护国军领导人刘伯承，老同盟会员、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吴玉章等，这些后来的著名共产党人，都亲身投入了反袁护国战争，立下了重大功绩，以实际行动支持和肯定了反袁护国战争。朱德明确地说，“民国再造，帝制铲除，推厥元勋，当以邵阳蔡公为最”。⁶

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的这些异口同声的言论，事实上进一步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是推翻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护国战争的伟大功绩，是维护了辛亥革命产生的共和制度，两者同样都属于民主革命的范畴。

护国战争的胜利，既提高了云南的声誉，也提高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地位。护国战争以后，云南讲武堂开始招收华侨学生及朝鲜、越南等邻国青年人学，使云南讲武堂成为不仅是近代中国的著名军校，也是东亚地区著名的国际军校。

护国战争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从云南开始发动的，首次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云南各族人民和云南讲武堂师生为护国战争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云南讲武堂在反袁护国战争中，立下了重大功绩，功震环宇，也大大提高了云南讲武堂的历史地位，从而促成云南讲武堂成为清末民初中国以至东亚的著名军校。

参考文献

- [1] 苏全有, 贺科伟. 袁世凯传（最新插图版）[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 [2] 张鸣. 共和中的帝制 [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 [3] 吕峰.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 [M]. 北京：同心出版社，2014.
- [4] 龙蛇北洋一《泰晤士报》民初政局观察记（下册）[M]. 方激，编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
- [5] 陶菊隐. 筹安会“六君子”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6] 庾恩旸. 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M]. 昆明：云南省图书馆，1917.
- [7] 蔡锷. 谕四川同胞文 [A]. 曾业英. 蔡锷集 [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 [8] 白之瀚. 云南护国简史 [C]. 新云南丛书，1946.
- [9] 刘云峰. 护国军纪要 [C].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⁶四川泸州《酒城新报》2018年3月7日。在泸州纳溪区档案馆新近发现的朱德1916年11月24日给中央政府报告的档案资料。

-
- [10] 由云龙. 护国史稿 [J]. 近代史资料, 1957, (4).
- [11] 朱德寄自护国讨袁前线的一封信 [J]. 近代史研究, 1980, (3).
- [12] 周开庆. 民国川事纪要 (第 1 册) [M]. 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 1974.
- [13] 史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M]. 上海: 三联书店, 1979.
- [14] 邓锡侯, 田颂尧. 四川护国战争始末 [C].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3 辑).
- [15] 董鸿铨. 护国军第三支队第二营人蜀讨袁日记 [N]. 义声报, 1916-04- (22-29).
- [16] 蔡松坡家书 [J]. 近代史资料, 1963, (4).
- [17] 蔡锷. 致唐继尧刘显世戴戡王文华电 [J]. 湖南历史资料, 1988, (1).
- [18] 护国之役总司令命令钞 [J]. 文献, 1979, (1).
- [19] 刘云峰. 护国军纪事 [C].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 10 辑).
- [20] 白蕉.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M]. 上海: 上海人文月刊社, 1936.
- [21] 唐继尧, 等. 为袁逆取消帝制致各省通电 [A]. 会泽首义文件牍 (上册) [C]. 云南图书馆, 1917.
- [22] 唐继尧, 等. 复北京黎徐段三公电 [A]. 会泽首义文牍 (上册) [C]. 云南图书馆, 1917.
- [23] 彬彬. 最新时局要闻 [N]. 上海《时报》, 1916-05-18.
- [24] 大事六•护国四 [A]. 续云南通志长编 (上册) [C].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5.
- [25] 孙曜. 袁世凯宣布帝制议案始末记 [A]. 中华民国史料 (中册) [C]. 上海文明书店, 1929.
- [26] 孟祥才. 梁启超传 [M]. 团结出版社, 2011.
- [27] 谢本书. “护国战争不是民主革命”: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伪命题 [J]. 求索, 2017, (2).
- [28]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A].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9] 致黎元洪国务院电 [A]. 孙中山全集 (第 3 卷) [C]. 中华书局, 1984.
- [30] 李宗黄回忆录一八三十三年奋斗史 (二) [M]. 台北: “中国地方自治设计委员会”, 1973.